

● 中华全景百卷书
历史系列

7

中华变法

秦 欣

● 北京出版社



X2-8 67

中华全景百卷书

阅览

○ 历史系列 ○ 中华变法

秦欣

北京出版社



102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根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精神而策划的。这是一套综合性强、品味高的爱国主义教育普及读物，是一所浓缩的爱国主义图书馆。它由100卷分10个系列构成。在明理、知事、动情、养成的四个环节上，用100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全景式地勾勒出祖国的古往今来和大好河山，用100个韵味浑厚的音符，合奏出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中华全景百卷书》是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指导下，由北京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总体策划，由100名专家分卷撰写而成，经首都出版界的共同努力，在建国45周年之际，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中华全景百卷书》异彩纷呈，正所谓开卷有益。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读了它，人们会感到做为当今中国人的使命与责任。

古人云：知天下事，读五车书。

我们说：读百卷书，激爱国情！

《中华全景百卷书》

编委会

顾问：徐惟诚 袁宝华 于友先
任继愈 苏星

总编委员会主任：李志坚

总编委员会副主任：何卓新 孙向东

总编委：范西峰 董蕴琦 李学谦

李伟 朱述新 母庚才

李建华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丁晓山	于振华	冯艳平	王红	王伟
王勉	王士平	王尔琪	王奇治	王品璋
王恩铭	王寅诚	王骊岭	区界名	石建英
卢云亭	田人隆	申先甲	刘达	刘彪
刘文彪	刘克明	刘树勇	刘振礼	刘俊华
刘峻骧	刘森财	成绶台	孙玉琴	孙彦钊
邢东风	李元华	李明伟	吕品田	吕金陵
朱立南	朱祖希	朱筱新	朱莱茵	朱深深
伍国栋	华林甫	向世陵	杨菊花	吴舜龄
宋志明	宋剑霞	忻汝平	江家兴	张正

张亚立	张兆裕	张则正	张鹏志	陈晓莉
陈绥祥	陆道中	武力	武玉宇	赵艳霞
罗静文	周亮	周育德	金启凤	金奇康
金德年	金德厚	宗时	空宇	郑玉辉
郑进保	泽昌	胡洁	胡振宇	郝旭
春晖	钟玉	郭文杰	郭积燕	郭素娟
袁济喜	夏继果	徐兆仁	徐庆全	钱治
唐忠	梁占军	涂新峰	黄同华	曹革成
蒋超	葛晨虹	鲁葳	焦国成	曾令真
谢军	郝爱红	裴仁君	熊晓正	戴瑞丰

※ ※ ※

总策划·总编辑:朱新民

执行总编辑:傅亿仲

副总编辑:贺耀敏 恽鹏举 刘占昌

装帧设计:王晖 尚云波

编辑人员:董凤举 曹革成 孙建庆

鲁葳 戴瑞丰

主旋律的音符

(总序)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历来是激励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伟大旗帜,是推动祖国社会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共中央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社会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要求人们从确立社会“主旋律”的高度认识其重要性,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作为引导人们确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共同基础。

前言：改革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看法，虽然至今众说纷纭，但至少有两点是为大家所公认的：第一，社会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第二，这种发展变化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但这并不是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一发展过程毫无作为。人们日常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对社会的发展往往有着重大的影响，使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快或慢，进步或倒退，狂飙式的质变或静悄悄的量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对社会发展所施加的影响只要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都是应该肯定的，都是值得讴歌的。

改革和革命一样，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革命不同的是，历史上的改革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由统治阶级倡导的；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服务的，但是它毕竟避免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同归于尽局

面的出现,因而是应该肯定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改革虽然经常表现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但它总是在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激化时出现,所以改革是由被压迫阶级推动的,由民众创造历史的曲折反映。

中华民族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改革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每一次历史的进步总是伴随着革命或改革的出现。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曾经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改革家。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洞察社会弊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领域中进行大胆的改革:例如大禹治水不循父法,启废禅让而行世袭,子产铸刑鼎以救世,李悝尽地力之教,吴起明法审令,商鞅变法强秦,秦始皇作制明法,汉高祖拨乱反正,汉武帝励精图治,王莽变法,汉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曹操行屯田立租调,魏孝文帝改革,隋文帝开启新制,唐太宗行新制而致治,永贞革新,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忽必烈祖述变通,张居正救时扶明,雍正新政,戊戌变法等。战国时期的第一次改革高潮,促成了秦汉盛世的出现;唐宋王朝的改革使中国封建王朝进入鼎盛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放射出异常辉煌的光彩;到了封建社会晚期,为

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又掀起了慷慨悲壮的变法图强高潮。总之，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同革命一样，无论是成功的改革还是失败的改革，都是先辈为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做出的巨大努力，都值得我们敬仰、缅怀。

一、商鞅变法

春秋战国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正取代奴隶主阶级，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有为之君无不进行变法改革，以图富国强兵。公元前445年，魏文侯用李悝为相主持变法；公元前389年，楚国吴起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以申不害为相推行改革；公元前357年，齐威王任用邹忌改革。在这一改革浪潮中，以公元前359年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和持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1. 以改革为己任

商鞅本是卫国人，以公孙为氏，所以称公孙鞅、卫鞅，后来主持秦国变法有功，封于商，因此又称为商君和商鞅。

商鞅早年钻研过刑名之学，后来到了魏国，在宰相公叔痤家中当家臣。在战国时代，魏国变法最早，李悝和吴起都在魏国主持过变法。这一历史传

统对商鞅肯定是有影响的。公叔痤很欣赏商鞅的才能，但来不及重用他就得了重病。公叔痤在病榻上请求魏惠王任用商鞅为相。魏王不以为然。公叔死后，商鞅就到秦国寻求发展。

秦国正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当时，秦国以东有韩、赵、魏、燕、齐、楚六个大国，淮水和泗水之间有十几个小国。周王室衰微，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秦国由于政治、经济落后，内乱不止，被各国当做夷狄看待，连盟会都不让参加。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后，面对这种屈辱的处境，发愤图强。他特地下了一道求贤令：宾客群臣凡是能出奇计使秦国富强的，我一定给他高官做，并给予封邑。商鞅通过景监的引见，谒见秦孝公。为了试探秦孝公变法图强的决心，开头两次，他只谈“帝道”、“王道”，就是不提富国强兵之道。秦孝公听了连连打哈欠，他对儒家的仁义学说不感兴趣，他要的是使秦国富强、称霸天下的良方。在第三次求见秦孝公时，商鞅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地纵论富国强兵之术。秦孝公听得出神，身子一点一点地往前挪，两人促膝作长夜谈，一连两三天，越谈越投机。最后，秦孝公决定请商鞅主持变法，公开宣布：“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

2. 便国不必法古

秦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旧势力、旧传统比较强大，而改革总是要触动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秦孝公一旦决心变法，立即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一场大辩论。

秦孝公宣布变法后，商鞅就明确表示：“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君主一旦确定变法，就不要顾虑天下臣民的议论。商鞅对于在秦国实行变法的艰巨性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他提醒孝公，一旦进行变法就不能犹豫不决，三心二意，不要受到人们的阻挠和反对就打退堂鼓。果然，当时守旧派代表甘龙和杜挚跳出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照着成法和老传统来治理国家，不会有什么过错，所谓“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又说：“拘礼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以论变。”商鞅的这些言论，反映了他决心进行变法的坚定意志和正确信念，也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关于后者，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第一，治国没有一成不变之法，富国强兵之道要根据不同的形势来制定。第二，应该不应该进行变法，变法的方针是不是正确，衡量的唯一标

准就是它是否有利国家和民众。第三，那种满脑子都是祖宗成法的人，根本不配谈论变法的事，他们的反对不足以阻挠变法的进行和成功。

经过一场辩论，秦孝公同意商鞅的主张，任命他为左庶长，主持变法。

3. 立木为信

中国古代的改革总是统治阶级倡导和主持的，但是，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有民众的认同和参与。在这方面，高鞅立木为信的故事对我们是很有启迪的。

关于民众与变法的关系，商鞅说过一句名言：“民可以乐成，面不可虑始”。这句话的意思是：老百姓只为事情的成功而高兴，用不着让他们参与事前的筹划。这句话反映了统治阶级对民众的偏见和轻视，但并不是一点合理的因素也没有。改革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它牵涉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对于这样一件复杂的事情，每个人只是从自己的处境和利害去看待，不可能通观全局。所以，在改革之初，使改革的具体步骤都征得人们的首肯，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从这一点来说，商鞅的话多少有其合理之处。

其实，商鞅还是懂得民众与变法成败的关系

的。变法的方案制定后，尚未颁布时，商鞅怕老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将一根三丈长的大木立在国都的南门，并且对百姓说，如果有人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就给他十金。许多人听了都很惊讶，谁也不敢去搬。商鞅又下令，谁能搬就给他五十金。有一人动了心，将大木搬到北门，商鞅命人当场兑付五十金，以表诚信。

立木为信的故事，反映了法家的“明法”思想，也就是韩非所说的：“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一切法令都要向民众公布，使他们知法，以取得民众的信任。这也是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他两次变法之令都公开向民众公布，据史书记载，当时连妇女和儿童都知道改革的法令，所谓“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史书还记载着这样一件事：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他在旧贵族的唆使下，对商鞅进行报复。商君逃到关下，想到一家客店求宿，店主不知道他是商鞅，就对他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凡是要住店的旅客一定要有证明，否则出了事店主就要连坐。虽然商鞅因此而遭到逮捕，但这件事说明：即使边远地区的普通平民都熟悉有关的法律条文，并且严格遵守。仅此就足以说明商鞅变法的深入人心。

4. 二次变法

商鞅变法前后进行了两次。

第一次变法于秦孝公三年(前 359)实行,推行五六年以后初步收到富国强兵的成效,并取得兼并战争的一系列胜利:孝公八年,秦国在元里打败魏国,夺取魏河西少梁之地。过了二年,商鞅迁升兼管军政的大良造,他趁魏国与齐、宋、卫、楚交战之机,逼降固阳,随即攻克魏旧都安邑。为了进一步推行变法并为战略东进做准备,秦孝公十二年,秦将国都从雍东迁到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与此同时,商鞅又主持进行了第二次变法。

迄今为止,记载商鞅变法最为详细的材料是《史记·商君列传》。据《史记》记载,商鞅第一次变法的内容有以下几项:

- (1) 令民为什伍,推行什伍连坐法;
- (2) 颁行“分异”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 (3) 强调以军功受爵,反对无功受禄;确立新的爵秩等级制度,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无军功者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 (4) 提倡公战,禁止私斗、私议、私交,为私斗

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5) 奖励耕织，抑制末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除本人徭役)，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在第一次变法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上述第三条。在商鞅变法以前，秦国的封爵主要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勋劳尚在其次；爵位世袭，即所谓世卿世禄制。商鞅变法提出“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并且参照东方各国和秦国的爵名制订了二十等爵，将以往“见功而与赏”的制度系统化、制度化了。据此，斩首封爵不仅有田宅、庶子和赏金等奖励，而且可以做官。官位的高低、俸禄的多少与军功的大小相应，这样，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世卿世禄制。一个平民只要在战争中斩获敌人的首级，立有军功，就可以根据首级的多少得到奖赏与功名，由此跻身统治阶级行列；即使是奴隶，也可以通过这一途径成为庶民，甚至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这一措施，不但极大地激励了战士杀敌立功的积极性，而且釜底抽薪，彻底根除了宗室贵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存在的基础，对于奴隶的解放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结果是使新兴地主阶级势力不断壮大，逐渐取代奴隶主贵族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

商鞅第二次变法的内容，则有以下几项：

(1) 禁止父子兄弟同室生息,这样不但改革民风恶俗,而且有利于人口的繁衍和农战政策的实施;

(2) 普遍推行县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这是中国行政体制的重大转变;

(3) 为田开阡陌封疆;

(4) 统一赋税;

(5) 统一度量衡。

以上几项中最重要的是第三项。所谓开阡陌封疆,就是废除原有井田制的区划,重新确立田界,用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取代百步为亩,这不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均平赋税,而且使土地占有权相对稳定,土地所有制也以此为契机,由公有向私有进一步转化。

商鞅的两次变法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使秦国国富兵强。据史书记载,第一次变法行之不久,“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第二次变法取得成功后,连周天子也致胙于秦孝公,东方各国的诸侯更是对秦国刮目相看,纷纷表示祝贺。

5. 商鞅虽死,其法行世

商鞅变法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它也并不是一